

论林肯的政治家风范

——对林肯的再评价

刘祚昌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曾对林肯作了多次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在一篇文章①里我对林肯否定得过多，过分强调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嗣后在《林肯解放奴隶的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8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认识提高了，我开始审查我过去在林肯评价中所持的旧观点，发现我过去对林肯的评价失于不公正。因此，我在197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林肯的进步性，把他评价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在同一文中我仍指出了他的某些错误和瑕疵，特别批评了他对南方叛乱者的“无原则的宽大”。

去年偶然忆起宋代叶梦得的的一段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价林肯，对他作出更多的肯定。叶梦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②

这显然是叶氏向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统治层人物提出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人应该具备德量、气节、学术及材能等四个条件，而其中以“德量”最为重要。我感到叶氏此语深有见地，在品藻历史人物方面洵是不刊之论。至于叶氏所理解的“德量”，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进一步深论下去。

但是，据我个人的理解，“德量”应该是一种很高的政治美德，一位有“德量”的政治家，应该心胸坦荡，有容人之雅量；能高瞻远瞩，气度恢宏；虚怀若谷，善于纳谏，而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德量”二字译成现在汉语，就是“政治家风范”。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和具体化，我认为，“德量”应该包涵以下几种政治品德：

第一，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乐于采纳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第二，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

第三，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能处处顾全大局，而不囿于某一特殊集团或个人的狭隘的偏见。

在我看来，林肯一生的行事，特别是他在内战期间内的活动和举措，就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因此他不愧为一位具备“德量”的伟大的政治家。我的这个结论是有下述事实为根据的。

(一)

在内战初期，林肯是反对解放奴隶的。

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地告诉国人说，他“无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奴隶制存在的诸州的奴隶制度。”

在内战爆发后，林肯在1861年4月15日发布的命令中，再一次保证他不会容许联邦军队破坏或干涉南方的财产（包括体现在奴隶身上的财产）。在林肯心目中，在这次内战中北方应该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而不应该为解放南方的黑人奴隶而战。

林肯不仅不干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扮演了南方奴隶制度的捍卫者的角色。许多逃亡奴隶离开南方种植场而逃到联邦军队驻地要求得到保护。但是，林肯一再命令战场上的联邦军队的将领们去阻止奴隶的逃亡，并且逮捕逃亡奴隶，把他们送回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

更甚者，林肯还罢黜了弗列蒙特将军的职务，因为这位将军曾在他所管辖的密苏里州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凡站在敌人方面持枪作战以反对联邦的一切奴隶主，其手中的全部奴隶予以解放。

在内战第一阶段，林肯就是这样对待南方奴隶的。

然而，到1862年下半年，林肯竟然改变初衷，放弃了原来维护南方奴隶制度的作法，而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林肯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预告性的“解放宣言”，宣布：南方叛乱者如果到1863年一月一日仍不放下武器，则叛乱诸州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

到1862年年底，南方叛乱者并没有放下武器，于是林肯乃在1863年一月一日凌晨发表了正式的“解放宣言”，宣布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自由。

1865年1月，由于林肯努力争取的结果，以在合众国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为内容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这样，到内战的第二阶段，林肯不仅由原来的反对奴隶解放的立场过渡到赞成解放奴隶的立场，而且把解放奴隶的政策贯彻到底。

林肯的这个剧烈的转变，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林肯本人作了回答，他承认强迫他做出他所不愿做的事情的，是客观环境，是军事情势的急速恶化。据他事后的回忆，当时他看到“事情越来越糟”，所以他终于感到“我们在我们所奉行的作战计划上已经走到了绳子的尽头：我们必须拿出最后一张牌，并且改变我们的策略，否则就要输了。现在我决定采取释奴的政策。”③

客观情势固然是推动林肯采取解放奴隶这个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林肯采取这个重大决策本身，意味着他虚心地采纳了内战开始以来一直反对他的反对派的正确意见，因为当他过去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时，他曾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这些反对派一再向林肯提出解放奴隶的要求。反对派包括两个集团：共和党内的急进派和社会上的废奴主义者。这两个反对派都异口同声地反对林肯的政策，要求他改弦更张，尽快地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他们

一致指出：解放奴隶会造成有利于联邦的结果，会促成战局向有利于联邦的转变。

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立普斯的发言尤其激烈，他在一次讲演中骂林肯为暴君。在另一次讲演中他猛烈地攻击林肯政府，说林肯本人“没有任何决心”，并且以谩骂的口吻说：“只要你们让这头乌龟继续领导政府，那末你们就是在用一只手挖洞，而且用另一只手同时在填洞。”④

1862年7月4日，急进派领袖查理·萨姆纳在会见林肯时告诉他说：他不但在北方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而且他“在南方，在叛乱者的后方”也需要人们，亦即奴隶的帮助。他需要做的一切，便是说出解放奴隶这句话⑤。

在要求解放奴隶的同时，急进派也指出武装黑人的必要性。急进派的另一位领袖塔都斯·史蒂文斯在众议院里提议把来福枪放到南方每一个黑人手中，让他们参加反对奴隶主的战斗，他说林肯太软弱，假如安得鲁·杰克逊⑥在世的话，他会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的。

“他会向奴隶制的核心进军，不是为了摘棉花，而是为了把武器放到每一个被解放者手中……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我们武器库中最可怕的武器。”⑦

总而言之，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林肯在实质上是采纳了一贯与自己作对的反对派的主张。这一点看来很容易，但是实际做起来是戛戛乎其难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个人面子、尊严乃至感情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弃自己原来的主张，而接受政敌的主张，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可多见的。我国北宋时代的王安石虽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是他做不到虚心纳谏，他把反对变法的人们的意见一一拒之于千里之外，甚至对其中一些人实行打击报复，以泄其私忿。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著称，他多次采纳了魏征的谏言。但是，魏征是他的臣下，究非政敌可比，他是站在维护李氏王朝的利益立场向太宗进忠言的，所以接受他的意见是容易做到的。而急进派和废奴主义者都是林肯政府的反对派，而且他们曾对林肯尽其讥讽、挖苦甚至咒骂之能事。接受这样政敌的政见主张，无异于吞下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林肯终于勇敢地吞下了这颗苦果。为什么林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他能以大局为重，他始终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恩怨完全置诸度外。

(二)

到1863年底，如何处理战后南方的问题，亦即所谓南方重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南方重建中，黑人选举权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黑人虽然获得解放，但是假若他们享受不到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的话，他们将会重新落到种植场主的压迫下，并且有可能重新下降到奴隶地位。

但是，最初林肯是反对授予南方黑人以选举权的。1863年12月8日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大赦和重建的宣言”，在这个文件里，他对黑人选举权问题只字未提，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

因此，林肯的计划立即激起了黑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愤怒谴责林肯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作法，并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黑人们开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林肯的态

度。一些黑人还组织起来，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1864年10月，在希拉古斯召开的全国有色人代表大会，是内战期间美国黑人争取选举权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会通过的“告合众国人民书”，举出许多有力的论据，说明黑人享有选举权的迫切必要性。在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黑人杰出领袖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起了突出的作用。他在一次讲演中向白人听众说：“如果你们需要选举权，那末我们尤其需要它。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是多数，而我们是少数；你们受到保护，但是我们有受到袭击的危险。”他警告说：“我们可以用刀剑征服南方军队，但是我们却消灭不了南方人的仇恨心理，南方人会向我们复仇的。那末什么是对付南方人这种恶毒敌意的天然力量呢？这就是：把选举权送给南方精神健全的、年满21岁的每一个有色人男子，这样你就会立刻得到四百万个朋友，他们将警惕地保卫，而且必要时用他们的武器保卫自由的方舟，以防止敌人发动叛乱去破坏它。”⑧

广大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对林肯本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林肯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话（1865年4月11日）中表示：“我本人现在愿意把选举权授给有知识的有色人以及曾作为士兵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有色人。”⑨

当然，最初林肯之剥夺黑人选举权，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的，因为他认为无知识的黑人使用选举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然而后来他看到许多新解放的黑人踊跃地参加联邦军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联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改变了对于黑人的成见。但是，不管怎样，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及他们发表的大量有关黑人选举权的言论，在改变林肯的态度中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清楚地表明：林肯是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是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的。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来说，倾听人民的呼声，采纳他们的意见，是一个很难以做到的事。但是，林肯做到了这一点。

（三）

在总统任期内，在整个内战期间，林肯在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时，在执行一切政策时，在做出任何重大决策时，甚至他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着眼全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他这种态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

一、在作战的目的问题上

在他的心目中，恢复联邦的统一是北方对南方作战的唯一目的。他的一切方针政策，一切举措都服从这个最高的目的。他的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内战的胜利结束时为止。

甚至在1862年下半年林肯已经决定发布预告性“解放宣言”之后，他仍持这个态度。这一年8月22日林肯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霍列斯·格瑞利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想拯救联邦，我想在不破坏宪法的情况下尽快地拯救它。……如果有人只是在摧毁奴隶制度的条件下才愿意拯救联邦，我是不同意的，我在这个斗争中的首要目的，便是拯救联邦，既非拯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不解放奴隶也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靠解放所有的奴隶而能拯救联邦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由于解放某些奴隶同时放着另一些奴隶不管而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假如我对于奴隶制度

或有色人种做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做，是因为我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而假若我忍耐着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我不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⑩

林肯之坚持把恢复国家的统一作为战争的唯一的、一贯的目标，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胸怀全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政治家。

关于北方在内战中的作战目标问题，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林肯与反对派（急进派与废奴主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与以恢复联邦的统一为作战的唯一目标的林肯不同，反对派主张北方应该为解放奴隶而战。二者孰是孰非，是一目了然的。首先应该认清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现实：南方奴隶主叛乱集团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宣布南方脱离联邦而另成立一个“国家”——“南方同盟”，因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下子被撕裂为两半。事情还不止此，南方叛乱者还不惜卖身投靠欧洲列强，妄图倚仗外国势力来压倒北方。而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为了重温其在北美大陆扩张领土的美梦，迫不及待地想武装干涉内战。假如南方叛乱者的阴谋得逞，美国的前途实在岌岌可危：它将重新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退一步讲，即使事情没有恶化到这个地步，国家的分裂也将严重地妨碍美国的进步发展，使方兴未艾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大的挫折。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唯一的对策便是通过军事斗争，粉碎南方叛乱者分裂国家的阴谋，以恢复联邦的统一。此其一。

恢复联邦的统一，对当时的美国说来，是决定一切的首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既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也谈不上消灭奴隶制度。试想：假如叛乱者一手炮制的“南方同盟”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下去，北方废奴主义者只能眼睁睁地看南方奴隶继续处在奴隶主的任意宰割之下，而一筹莫展。当然，为了恢复联邦的统一，必须取得内战胜利，为了取得内战胜利，解放奴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恢复联邦统一与解放奴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国家全局着眼，恢复联邦的统一究竟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是目的；而解放奴隶究竟是次要问题，是手段。此其二。

因此，林肯之把恢复联邦统一作为进行战争的唯一目标，是非常正确的。他这样做，说明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比反对派看的更宽更远，说明他有顾全大局的伟大气魄。

二、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

如前所述，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是反对解放奴隶的，是坚持拒绝实行废奴政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站在北方资产阶级立场上，关心保护一切私有财产，耽心一旦解放南方奴隶，将损害奴隶主的财产权（因为奴隶便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从而威胁北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一种所有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⑪其次，林肯之反对解放奴隶，也是因为他害怕宣布奴隶解放将推动边境奴隶州（内战爆发后，几个边境奴隶州由于种种原因仍留在联邦内）脱离联邦而投到南方叛乱者怀抱中去，这样一来就会失掉边境诸州这个进攻叛乱者领土的重要基地。

但是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林肯把恢复国家统一放在首要地位上，因而集中全力镇压南方叛乱。这就使得他无暇考虑包括奴隶制问题在内的其它问题。第二，北方广大人民对奴隶制问题漠不关心，甚至有不少人反对解放奴隶。占北方人民中的大多数的农民所

关心的是自己的直接的物资利益——土地问题，他们特别希望政府解决西部土地问题，而视南方奴隶制存在与否与自己无关，至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说来农民不关心奴隶解放问题的主要原因。北方工人大多数则反对奴隶解放，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南方奴隶一旦解放，会在劳动市场上排挤他们。由于种族主义作祟，北方人民中间有不少人歧视黑人，认为黑人注定当奴隶，所以也反对奴隶解放。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同情奴隶解放。

林肯不能不考虑北方广大人民的这种情绪。在他看来，如果逆着群众的舆论而一意孤行地贸然宣布奴隶解放，会挫伤人民的情绪，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去镇压南方叛乱，不利于国家统一的恢复，归根结底，不利于国家全局的利益。

由此可见，在内战初期，林肯之不愿解放奴隶，正是他顾全大局的表现。

有趣的是，在1862年下半年林肯之一改已往的政策，而毅然宣布解放奴隶，也是他顾全大局的表现，因为他之采取这个决策，也是为了为恢复国家统一这个更高的目标服务的。他清楚地理解到：在战局不利（到1862年年中，北方军队在战场上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扭转战局，为了取得内战的最后胜利，以便胜利地完成恢复国家统一这个大业，除选择解放奴隶这条道路别无其它道路可走。第一，他认识到：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和同情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赢得国际进步势力的同情，才能挫败英、法的武装干涉，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解放奴隶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他也充分估计到：为了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必须摧毁南方的经济并且把南方黑人这支重要战斗力量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以供北方使用。而为了达到这双重目的，解放奴隶的步骤，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一句话，他尖锐地看到：为了取得内战的最后胜利，非宣布解放奴隶不可。这从他自己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明。1862年9月，林肯对芝加哥新教徒代表团说：“……我也承认解放奴隶会在欧洲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后果……而且我更认识到它在北方也将有利于我们……那时，无问题它将把对于南方极其重要的劳动者拉过来，从而削弱叛乱者的力量。”在另一个场合，林肯也表示：“假如不采取解放奴隶的政策的话，人力是不可能平息这个叛乱的，任何其他政策都不足以削弱叛乱的道德的、物质的力量。解放奴隶会给我们带来在南方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二十万人（指黑人奴隶——引者注）。它还会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它使敌人减少同样多的东西。”^⑫又一次，他对急进派领袖萨姆纳说，他需要一切可能找到的人力，其中包括“叛乱后方”的奴隶。^⑬

要之，林肯在内战初期之反对解放奴隶及他在内战后期之同意解放奴隶，都是从一个立场出发的，那就是：着眼于恢复国家的统一，着眼于全局的利益。这附带地证明林肯从始到终都不是一位废奴主义者，即使到他死前为止也是如此。因此，数年前有的人提出关于林肯是废奴主义者的问题，是甚无谓的。

三、在和谈及赔偿南方奴隶主的问题上

1865年2月2日，在南、北之间举行了一次和平谈判，但这次会谈没有取得结果。过了两天后，林肯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向内阁成员们提交了一份他准备向全国提出的咨文。他在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向所有的奴隶州交付四万万美元，以赔偿奴隶主因解放奴隶而蒙受

的“损失”。这笔款项准备分配给南方各州，各州所得钱数与各州所拥有的奴隶的数目成正比比例（奴隶的数目，以1860年的人口调查为准）。但是，向奴隶主进行这个赔偿，是有条件的，即：南方叛乱诸州必须在这一年4月1日以前放下武器，停止对联邦进行的一切武装抵抗。但是，内阁阁员们一致表示不赞成他的这个提议，劝他不要向国会提交这样的咨文。于是，林肯长叹了一口气，把这份文件收在皮包里。

为什么林肯如此热心于赔偿政策？那是因为他感到这样做可以加速和平的到来，从而会节省大量战争开支，避免人的大量牺牲。在与内阁阁员们的谈话中，林肯的这个意图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当阁员们表示反对林肯提出的关于赔偿的建议时，林肯发问道：“战争会持续多久呢？”接着他自己回答说：“一百天。现在我们为了进行战争每天要花费三百万美元，这将等于这笔钱的全部，此外还必须加上生命的损失。”^⑭

这个插曲表明：与好大喜功、以人命为儿戏的黩武主义者不同，林肯是把战争看成是万不得已的事，而把国家及人民的福利看得高于一切。林肯照顾全局的伟大的胸怀，于此可见一斑。

四、在南方重建问题上

1863年12月，林肯发布了一项“大赦宣言”，其中包括他的南方重建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南方诸州应该依据以下诸原则组成新政府。

第一，一切参加叛乱的人，只要他举行宣誓，表示效忠于联邦宪法并且废除奴隶制度，那末就可以对他实行大赦，恢复他的全部财产（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例外），不在大赦范围内者，只是“一切所谓南部同盟政府的民政的或外交的官员或工作人员；一切离开合众国的司法岗位去帮助叛乱的人；一切所谓南部同盟政府陆海军军官其职衔在陆军上校或海军上尉以上者；一切离开合众国国会席位去协助叛乱的人；一切辞去合众国陆海军职务然后去援助叛乱的人”以及非法地不以战俘对待联邦军队中的有色人士兵者。上述几种类型的人，均无权参加选举和担任官职。第二，在叛乱诸州的每一州，只要参加脱离联邦前最后一次选举的选民有十分之一以上举行效忠宣誓，就可以分别举行选举，成立新的州政府，并且选出代表，参加国会两院。这样，叛乱诸州就可以成为联邦中平等的成员。此外，宣誓效忠的选民必须具备1860年这些州的选举法规定的条件。^⑮

这个计划的特点有二：第一，只是剥夺“南部同盟”中的少数高级文武官员的政治权利，而使绝大多数的叛乱分子逍遥法外，继续享有选举权及担任官职的权利。第二，使绝大多数的叛乱分子的土地财产得以保存下来。

这说明：林肯对于敌人是多么宽大！

前些年，我在“论林肯”那篇文章中曾批评林肯对待叛乱分子的这种宽大的政策，并且认为这是他的严重错误。但是，现在我放弃了这个观点。按照我现在的见解，林肯对敌人的宽大，并不是他的大错。恰恰相反，他的这个态度正足以显示出一位心胸开阔、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的器识和度量，是他照顾大局的重要表现。林肯之所以这样宽大为怀，并不是出于所谓“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而是由于他认识到这样做可以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的局面。很清楚，严厉惩罚南方叛乱者，会使北方许多人感到快意，但是同时却会在南方叛乱分子中间播

下仇恨的种籽，助长他们的复仇心理。这样一来，一次内战虽然过去了，第二次内战将会接踵而至，美国将重新被淹没在战争血泊中，国家前途将不堪设想。林肯本人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过，他赞成按照给叛乱分子带来最少的屈辱的条件重建南方。他还说过：那是“最温和的，也是最明智的政策。……曾经叛乱过的人民……假若他们感到自己脖子上被套上一个枷锁的话，一定不会变为良好的公民。”^⑩

当然，林肯对待敌人的宽大，也是有原则性的，有限度的。这特别表现在奴隶制问题上。尽管林肯在一系列问题上向敌人让步，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在南方重建计划中是如此，在1865年2月2日和平谈判中也未尝不如此。他之在内战后期一直坚持废奴政策，并不是因为这时他已变为废奴主义者，而是因为他认识到废除奴隶制度及解放奴隶不但对战争有利，而且也对国家前途发展有利。同时，在内战后期林肯之所以坚持把废除奴隶制的政策贯彻到底，也与他的性格中的下述优点有关：他不做则已，一旦做出重大的决策，决不后退一步，而是把它坚持到底。

五、在处理战败敌人的问题上

在内战胜利结束前后，林肯又一次向叛乱分子显示出异常的豁达大度。

1865年3月4日在连任总统的宣誓大会上，林肯在简短的演说中表示：“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存任何恶意；对一切人都要慈悲为怀……”^⑪他这句话是有所指的，他是在暗示：要对南方叛乱分子实行宽大政策。4月13日他对一个南方人说：“我爱南方人甚于他们之爱我。我的愿望便是恢复联邦。我不想伤害南方任何一个人的一根头发，假如可以避免这样做的话。”^⑫

1865年3月28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谢尔曼将军曾向林肯问道：“应该怎样对待叛乱军队，当他们被打败了的时候？而且应当如何对待象杰斐逊·戴维斯（南方叛乱首领——引者注）这样的政治领袖等等？我们应该让他们逃走吗？”当时，林肯回答得很含蓄，并没有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但是他暗示戴维斯应当“出国”。

4月14日，当有人要求林肯下令逮捕戴维斯及其内阁阁员（当时这些人正在准备逃亡到加拿大去）时，林肯表示反对，他说：“如果你捉到一头象的后腿，而它正在跑，那末你最好是让它逃走。”^⑬

每当有人问林肯：如果戴维斯被捕的话，他将如何处理他时，林肯总是讲述同一个轶事：

“当我在印第安纳当小孩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走到一个邻人家中，发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男孩用一条绳子拴着一只浣熊。我问他那是什么，和他正在做什么。他说，‘那是一只浣熊。爹爹昨天晚上抓住六只，除了这个小家伙而外，他把其余的都杀了。爹爹嘱咐我把它拴住，一直等到他回来，我害怕他也把这个杀掉；噢！亚伯，我希望它会跑掉！’‘好吧！那末你为什么不要把它放走呢？’‘那样做不好，如果我把它放走，爹爹会揍我的。但是如果它自己跑掉的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现在，”林肯说，“如果亚斐逊·戴维斯和其余的家伙们只要逃走的话，那是再好没有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逮住，然后我又把他们放走，‘爹爹会揍我的。’”

依照林肯的意见，有关当局把戴维斯轻轻放过，使他逍遥法外。只是在林肯被刺身死之

后，他才被逮捕归案。

而且同样依照林肯的意见，格兰特将军允许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的叛军统帅李将军的军队解甲归田，而不予任何惩处。

林肯对待南方叛乱者如此宽大，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消除被打败了的敌人的复仇情绪，藉此从根本上消除他们将来重新挑起内战的可能性。可见林肯这样做，仍是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的。

(四)

在内战期间，在共和党内形成了两大派：急进派和保守派。

急进派代表资产阶级内部最坚决的集团，他们反对奴隶制度不遗余力，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也最为彻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彻底消灭奴隶制度，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急进派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态度也很坚决，主张彻底打倒南方奴隶主，不但主张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且也要求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少数急进派甚至建议把没收来的南方种植场主的土地分配给被解放的黑人。

保守派反映北方大资产阶级和边境州的奴隶主的利益，他们虽然关心联邦的重新统一，但是反对废除奴隶制度。他们也要求对南方奴隶主叛乱分子实行宽大政策，反对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这个纲领与他们的上层有产阶级地位和奴隶主的立场，以及他们仇视人民的态度有莫大的关系。

林肯则是超然于派别斗争之上的人物，他不属于上述两派中的任何一派^②。

在内战的初期，林肯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保守派的态度一致，但是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实际上他和保守派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面的。保守派站在大资产阶级和边境州奴隶主的立场上，以本集团的狭隘的眼光看问题，而林肯却处处以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依归。

内战第二阶段，林肯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与急进派一致，但是二者的出发点则迥异其趣。急进派之主张解放奴隶，是他们单纯从资产阶级内部的一个集团的狭隘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林肯之同意解放奴隶，却是从全国整体利益着眼的。

在这一阶段上，林肯在奴隶解放问题上也是与废奴主义者态度一致的，但是二者的目的却不大相同，废奴主义者是为了解放奴隶而主张解放奴隶的，而林肯则是为了夺取内战的胜利，为了恢复国家的统一的目的而同意解放奴隶的。

可以说，无论是保守派，急进派，还是废奴主义者，都是从局部看问题的，其见解主张都有其片面性，特别急进派更是趋于偏激。只有周旋于这些党派之间的林肯，始终坚持了全面的观点，能从整体看问题，处处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必须看到：林肯之着眼全局，他之顾全国家整体的利益，在本质上意味着关心资产阶级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合乎国家整体的利益，在实质上就是符合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囿于资产阶级个别集团或阶层的狭隘的眼光和利益的保守、派急进派乃至废奴主义者不同，林肯的一切想法、行动和政策方针均顾及资产阶级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因此，林肯并不是一位超阶级的国家元首，而是一位

三十五年来我国世界现代史研究概况

张培义

世界现代史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它萌芽生长，如今已鲜花盛开。1979年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正式成立，会员达150余人，全国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有500人左右。三十五年中，相继出版了几部自编教材，发表论文资料6095篇，译文4709篇。^①

回顾建国以来世界现代史的研究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它和我们整个国家前进的步伐是相一致的。当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开展的时候，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就生气勃勃，欣欣向荣；当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就死气沉沉，落落萧条。这样，该学科的研究进程就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初期阶段。旧中国，各类学校根本不开世界现代史这门课，更没有专门研究机构，有兴趣的研究人士也屈指可数。只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各文科高等院校才把世界现代史列为基础课之一，国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培养了第一批史学工作者，随之开始了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在1949—1966年的十七年中，各种报刊共发表论文资料1,818篇，译文2,456篇，平均每年发表论文资料120篇，译文190篇。研究方向和重点，以苏联史为主，这方面先后发表论文资料231篇，译文298篇。这些文章介绍、综述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情况，以配合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农

注①本文所引用数字见下表。该表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辑的《世界现代史报刊论文资料目录索引》一书统计绘制的，虽不甚确切，但反映了大体概况和总的趋向。

心胸广阔的、眼光远大的资产阶级的伟大的政治家。

[本文系本人去年在美国讲学内容的一部分，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最近译成中文，并且作了一些加工]

〔注〕

- ①见拙文：《林肯·黑人与奴隶制度》，《光明日报·史学》1963年4月。
- ②〔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 ③④⑦卡尔·桑德伯格著：《战争年代中的林肯》，英文版第一卷，第582、557—558、561页。
- ⑤兰德尔：《总统任期内的林肯》，英文版第二卷，第153页。
- ⑥安德鲁·杰克逊是十九世纪上期的美国一位总统。
- ⑧方纳：《道格拉斯的生平和著作》，英文版第三卷，第420—422页。
- ⑨⑫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英文版，第165—164、85—86、99—100页。
- ⑩⑬康马杰编：《美国历史文献》，英文版第一卷，第417—418、430—431页。
- 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册，第39页。
- ⑭迈克尔·克劳斯：《1866年以前的合众国》，英文版，第497—498页。
- ⑮⑯⑰⑱卡尔·桑德伯格著：《战争年代中的林肯》，英文版，第四卷，第48、235、352、239页。
- ⑲斯特伦斯基著：《林肯传》，英文版，第246页。
- ⑳我在我所写的《美国内战史》第206—207页中说：共和党分为三派，林肯代表中间派，这是错误的，应该纠正。作者注。